

#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七九年夏

陳天



#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七九年夏

## 目錄

聯合書院前任院長紀念肖像揭幕·····	一
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二
訪問劉殿爵教授·····	三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	十
香港語文教育研討會·····	十五
藝術系作品展覽·····	十六
封面：三體石經 春秋經	



「中文大學校刊」為純粹報導性之刊物，由中文大學出版，贈予大學教職員及各方友好。

### 大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宋 淇先生（主席）

姚啓昭先生

張端友先生

陳德全先生

陳燕齡小姐（秘書）

### 校刊編輯

宋 淇先生（編輯）

陳燕齡小姐（副編輯）

通訊處：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 聯合書院前任院長紀念肖像揭幕

聯合書院校董會鑒於前任院長鄭棟材先生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至一九七七年二月任職期間，日長歲久，成績斐然，特贈送鄭氏油畫肖像予該書院，以資紀念。

揭幕儀式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聯合書院會議室舉行。鄭棟材先生應邀主持本人肖像揭幕禮，校董會主席胡百全博士致辭惜別。今後，該肖像將長期在聯合書院會議室陳列。

出席揭幕儀式的，還有校董會副主席邵逸夫爵士、聯合書院院長薛壽生教授、以及校董會各委員。

鄭棟材先生現為本校教育學院院長，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九年二月任本校副校長；出長聯合書院前，曾任首席副華民政務司。

## 胡百全博士致詞

鄭先生、薛教授、各位校董：

本人今天能代表校董會向聯合書院致送鄭棟材先生的油畫肖像，感到十分高興。

各位都知道，鄭先生自從一九六三年一月起至一九七七年二月大學改組後出任副校長止，一直是聯合書院院長，任內，本院各項重要的發展都由他策劃。一九六三年十月，香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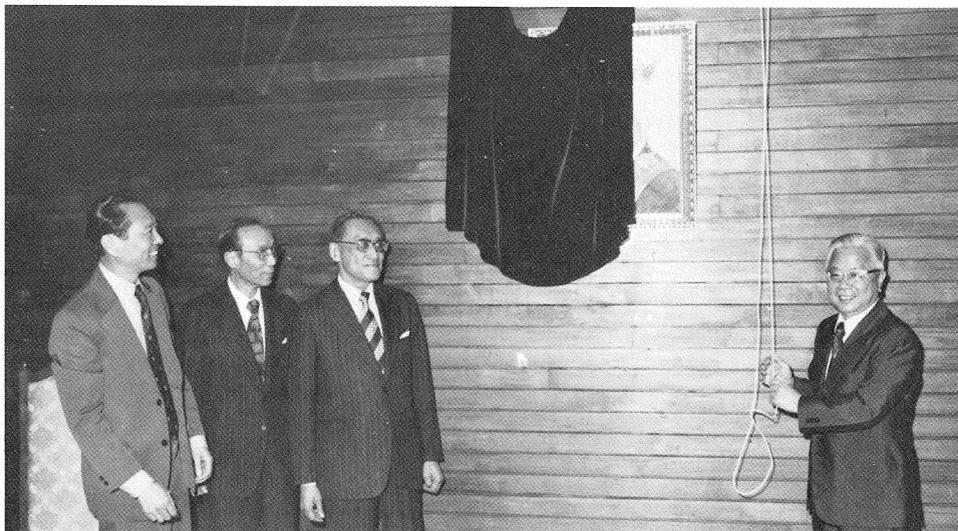
文大學成立，聯合書院成爲其中一員。一九七一年三月，本院的五所校舍在沙田現址奠基。翌年一月，聯合就遷到了現有的校園。

在鄭院長的領導下，本院發展迅速。近年來本院入學的人數大增，師資和學生的質素獲得提高，整個校園充滿了生氣，正是聯合書院發展迅速的結果。同時，本院和本港社會的關係也更趨密切。自從聯合書院於一九六五年擴大了校董會的組織以來，許多熱心高等教育的公共團體在校董會裏都有了席位。另一方面，聯合書院對於社會也貢獻良多。譬如舉辦工商業管理訓練課程就是其中一項。同時，本院的學系也不斷增加。

鄭先生在中大服務了十七年，成績卓著。今年十月，鄭先生就要退休了。在此，本人還有兩點需要補充：鄭先生任聯合院長期間，有好幾個學期曾兼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同時，鄭先生任教育學院院長，迄今已有六年。

雖然鄭先生不久就要退休，但退休後鄭先生還會在校董會和我們共事，他在聯合的建樹，此後將永遠受人懷念；他在中大的建樹，我相信大家也必定會永識不忘。本人謹代表校董會向聯合書院致送鄭先生的肖像。現在請鄭先生爲肖像揭幕。

（右起）鄭棟材先生、胡百全博士、邵逸夫爵士、薛壽生教授。



# 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即將出版的「增訂鳥蟲書匯編」

鳥蟲書匯編 恭綽

鳥蟲書匯編 恭綽

鳥蟲書匯編第一

侯 昌摹輯

式 尹文舉 私印

子 吳季子之用 子利

趙王上

九印符

元仁上

齊公貞 經

西郭符

元仁上

鳥蟲書匯編

一一一

中國文化研究所於一九七九年一月成立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以中文系劉殿爵教授為主任。

## 宗旨

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在於：

- (一) 就中國語文作純學術性之研究
- (二) 針對本港目前要求提高中文教學水準之需要，作一系列之研究，俾能提供切合實用之成果

## 研究及出版計劃

### (甲) 短期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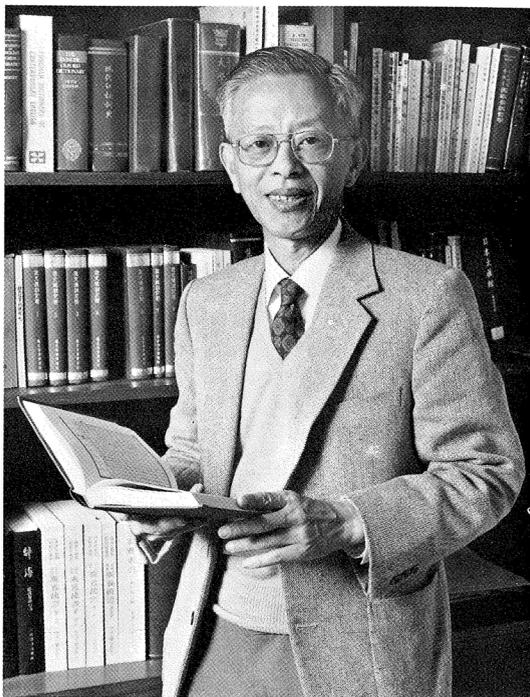
- (一) 與大學校外進修部協辦「中國語文文憑課程」
- (二) 出版「中國語文研究」季刊，刊佈學術性研究及語文教學兩方面之論文
- (三) 研究中學中國語文科課本
- (四) 研究小學國語科現行課本

### (乙) 長期計劃

- (一) 研究香港中小學中國語文教材及教學法
- (二) 研究漢語語法
  - (甲) 古代漢語
  - (乙) 現代漢語
- (三) 廣州話與普通話語法比較
- (丁) 廣州話與英語語法比較
- (四) 編纂一般讀者適用之常用字詞典
- (五) 編纂中學生適用中文字典
- (六) 編纂小學生適用中文字典
- (七) 編印「中國語言學文獻目錄」叢刊
- (八) 製作為許禮平編「中國語文」索引
- (九) 製作中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科錄音帶（與校外進修部合作）
- (十) 製作常用字詞及熟語粵語正讀錄音帶（附小冊子）（與校外進修部合作）
- (十一) 出版常用漢字字形辨正
- (十二) 編印中國語文研究叢書
- (十三) 第一種為「增訂鳥蟲書匯編」

## · 問訪 ·

# 劉殿爵教授



劉殿爵教授生於一九二一年，在香港大學修中文，一九四六年赴格拉斯高大學深造，攻讀哲學。自一九五〇年起，即在倫敦亞洲及非洲研究學院教授中國哲學。一九六五年獲聘為倫敦大學中國哲學教授，一九七〇年升為中文講座教授。

劉教授曾經出版「老子」、「孟子」及「論語」的新譯本，並計劃翻譯「大學」與「中庸」合成「四書」英譯本出版。所編「魯迅小說集：詞彙」已於最近出版。

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學鑒於其在海外不斷努力推進中國文化，成績斐然，特別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劉殿爵教授。

劉教授於一九七八—七九年度應邀前來中文大學任教，擔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並負責籌創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問：我們知道你很關心香港的粵音問題，對目前書面語讀音的混亂情況深以為憂，請問這混亂的根源在那裡？

答：中國字的讀書音向來都很穩定，因為中國人讀的都是同一的課本——經書，讀音也都以中古韻書的切音為依歸。老師教學生，口耳相傳，不會錯到那裡去。辛亥革命以後，新式學校興起，代替了舊式私塾，以方言為教學語音的地區的讀音教學，便出現了問題。

目前香港的讀音混亂根源，不客氣說一句，是來自教室的教學。許多教師本身，既不能讀出正確的字音，又懶得去翻查字典韻書，那就很容易教錯學生。此外，傳播媒介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播音員往往不明白口語和讀書音的區別，或者只懂得一字一音。例如玩耍的玩字，口語應該讀「環」音而不是「換」音。我在電視劇聽見過有人讀「玩（換）耍」。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問：目前這種讀音混亂的情形發展下去，有甚麼不良的後果？

答：最大的惡果是妨礙溝通。而且任何方言都有它一定的特質和演變規律。方言和方言之間也有一定的對應規律。如果粵語讀音混亂，不止會擾亂本身的語音規律，在學習普通話或其他方言時也會引起困難。

問：現在有許多字的讀音都和以前不同，這不是語音演變的正常現象嗎？

答：目前香港的情況，不是語音的演變，而是一片混亂，因為這些轉變都是毫無規律可尋的，只是各人隨意亂讀。

問：那麼要矯正這混亂情況，應該採用什麼方法？

答：如果要矯正混亂的讀音情況，與其尋一套

新的規律來將讀音規範化，倒不如恢復以前的正確讀法；正確讀法是要在韻書上找根據，口語是不能脫離書面語而談規範化的。

問：對於語音上的「撥亂反正」，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可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答：研究中心很希望能夠為粵語讀音規範化略盡棉力。中心現正着手編纂「粵音字彙」，以宋朝的「廣韻」和「集韻」、唐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為根據，並參考黃錫凌的「粵音韻彙」之類的書，標出字的正確讀音。

此外，中心又打算與本校的校外進修部合作，出版唐詩三百首等書的粵語錄音帶，作為正音的典範。

問：你剛才談論的是粵音問題。粵語只是一種方言，究竟方言在語言文化上應佔什麼地位？

答：從文化的觀點看，我們應該重視方言，保存方言。因為許多方言的文化歷史比國語或普通話長得多。這些方言的背後，都有一套很有價值的文化傳統，一旦抹殺了，就很可能。現在世界上有一種趨勢，就是方言鄉音逐漸抬頭。拿英國廣播界來說，三十年前如果你發音不標準休想打得進去，但近年來，情形已有改變，如果要進入廣播界，說英語帶點鄉音也不成問題了。

不過，如果從政治的觀點看，則必然會主

張語言文字統一，務求貶低方言的地位。如果中國沒有統一的文字——漢字，恐怕早就跟歐洲一樣，分裂成爲很多小國了。所以語言文字統一，實在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問：作爲一個文化人，那你不是比較傾向於用文化觀點看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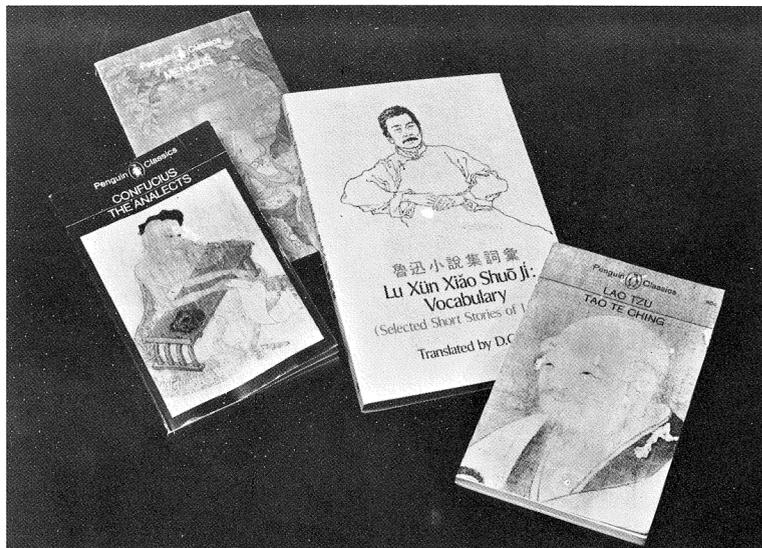
答：在不妨礙全國語言統一的前提下，我認爲方言和地方性文化是應該盡量保存的。

問：但是撇開文化政治不談，語言的功用在於溝通，如果各地都用方言而放棄普通話，豈不把溝通的範圍縮小，限制了語言的功用？

答：溝通可以從兩個層面上講，如果說日常生活應對，只要學點普通話就可以了，這是有限度的溝通；但如果要徹底溝通，則雙方都要對所用的語言極爲精通。可是在一般人用起來，普通話不能像方言那樣表達精密的思想，卻是實際問題。以方言爲母語的人，如果要說另一方言或以某種方言爲基礎的普通話，運用自如的範圍總是有限的，必不能超出其經驗中所接觸的範圍。

問：我們應該怎樣去了解母語？

答：一個人一生之中，最初幾年所學所說的語言，雖說是這個人的母語，但如果不在同樣的語言環境裏持續下去，這仍不能算是母語。熟諳雙語的人，生活的社會也必定是雙語的。



劉殿爵教授譯作

舉個例說，在倫敦：意大利人相當團結，他們有自己的文化活動，於是也能造成很自然的語言環境，因此第二代的意大利人除了能說英語外，也還能說意語，可是第三代的意大利人則變成只會聽意語而不會講了。至於在英國的中國人，第一代多數教育水平較低，而在英國長大和受教育的第二代，雖然年幼時在家裏說某種中國方言，但以後因進入另一個語言環境，反而在家中與父母沒有共同的興趣或話題，更談不上任何有系統的文化活動，所以大多數都只懂英語，對本身的语言已只會聽不會講了。

問：你對於目前香港教育界人士提倡「以母語為授課語言」，有什麼意見？

答：我認為不管採用什麼語文的課本，授課語言應該用學生通曉的語言，否則就會限制了學生的了解、思考、表達能力。香港學生通曉的語言一般是粵語，所以說用「母語授課」就應該是指用粵語授課。目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時遇到了很多困難。例如學生用的是英文課本，老師講解用的是英語或粵語，他們用粵語思考，但却不可能用粵語作書面的表達，加上受了語文程度的限制，又無法運用通暢的語體文或英文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不過這個難題，在社會沒法提供一個單語的環境前是不容易解決的。

問：可是現在大家都認為香港的中英語文程度

日漸低落，請問你可以談談學習中國語文的方法嗎？

答：以前廣東人學寫文言文是學習跟口語結構不同的一種書面語，現在寫語體文，我們同樣也要學習一種非廣東口語的書面語，因為語體文大體上是北方語言，學文言文有範文，要熟讀範文才能掌握文法、詞彙等特徵。可是優秀的白話文範文卻不多見，而且從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白話文本身也在不斷地演變着，三十年代的名作，今天看起來，我們可能覺得並不合乎我們的語言規律。加上我們寫語體文，必須把粵語逐句翻譯成普通話，翻譯時就會出現偏差，譯得不好，原來構想時許多精密的地方便無法表達，所以語體文並不容易學。文言對於語體文寫作有一定的幫助。如果多讀些文言文，有時可借用些文言文的詞彙；同時，熟識文言文句法結構，往往也能用來避免一些累贅的語體文結構。

我認為翻譯有助於語體文的學習。通常我們說翻譯，只限於兩種語文之間的翻譯，但我現在所說的翻譯是指把文言文翻譯為語體文。文言與語體文的距離很大，翻譯時不但要忠於原意，而且要寫出通順的語體文。如果有這樣的翻譯基礎，就不會出現那些違反中國語法的歐化語法等毛病。外國許多有名作家都通拉丁文，受過嚴格訓練，能把拉丁文翻譯成準確通順的英文。總括來說，深厚健全的翻譯傳統，有助於語文本身的發展和寫作。

問：但是中國很早已經翻譯佛經了。

答：以佛經作為翻譯的開端，一點也不適宜，因為佛經裡的話是佛說的，所以翻譯時要求完全貼合原文，所以多是硬譯，難免違背中國語文的語法精神。從這方面來說，佛經的翻譯並不成功，而中國也未能就此建立起優良的翻譯傳統。

此外，印度人很早便對語法有甚深的研究，如果中國在介紹佛法的同時，能向印度人學習語法這一門學問，就不必等到十九世紀才有第一本語法書出現，而今日的語文教學也不會這樣落後了。

問：聽說你想編一本古代漢語英譯的字典，是嗎？

答：是的。我認為字典的編纂，應以斷代為原則，我的設想是從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一百年做起。中國編字典的傳統有兩大缺點：一是不着重用法，其次是解釋字義的時候，不用定義，而用同義字。中國最早的字典是「爾雅」，但這只是將古書的注釋收集起來，解釋時是用「a、b也」這一形式，對於意義完全不加區別。這其實是中國人思想上的特色，就是只看相同之處，不看歧異之處，所以我們有很多像「殊途同歸」、「三教同源」等成語。

我認為先要把上面所說的二百年內的古書全部輸入電腦，以使用電腦把這些資料加以

整理。現在的字典把每一字，分為若干個意義來解釋，但這只是把古書的注釋全部放進去，並列為不同的意義。現在要編字典，必須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後歸併為較少的若干意義，因為其中有些意義是雷同的。此外，在每字每義之後須要列舉例句，說明用法。

問：隨着時代的變遷，社會組織改變，中國古代思想是否仍適用於今天的社會？

答：任何思想，尤其是道德思想，基本的和抽象的原則不會太受時代變遷的影響；原則越抽象越有一般性，則越能持久，例如說不要損人利己這原則，在什麼時候都適用。但是越上層的道德規則，則與當代社會的關係越密切，社會時代一變，往往就要修改。例如說以前或在某些社會戴帽子才算有禮貌，但今日戴帽的人絕無僅有，這種禮節便不再適用。

儒家所說的禮是條文、具文。義是原則，兩者之間的關係很值得我們深思。任何一種抽象的原則本身無法起作用，要起作用，一定要通過條文。但因為條文是具體的，所以有局限性。兩者的關係是辯証的關係：條文表現原則的精神，但時代一變，就要按照精神來修改條文。所以我們要繼承精神，不能繼承條文。

問：儒家的道德思想是不是也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答：儒家對道德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論語」中不合情理的地方很少，所以才能夠世代相傳；那些不合情理的成分，主要是後人加進去的，並不見於孔孟的原始儒家的典籍。

儒家思想一代一代的受盡歪曲，歷朝皇帝爲了鞏固權力，一定要控制當時最受重視的流行思想。儒家在傳統中佔重要的地位，所以受權勢的壓力最大，吃權勢的虧最多。許多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不能堅守原則，經不起統治權力的威迫利誘，往往把合理的道理歪曲了去迎合權勢。例如，皇帝要求愚忠，而愚忠最現成的根據是愚孝，於是造出很多愚孝的故事來，這就把孝道歪曲了。

又例如，一千多年來，婦女談貞節，寧死不再嫁，這是否原始儒家的意思呢？我們從「白虎通」裡轉引曾子的一句話，就可看出不是，曾子的話是：「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意思是如果與妻子離婚，要拿些無關重要的事來作理由，不要令到她不能再嫁，可見在「白虎通」所引的書，甚至在曾子的時代，女子是可以再嫁的。

我們現在還可以隨時看到受歪曲了的儒家思想，例如說，皇帝、父親、老師的話是不會錯的，他們有無上權威。「於吾言，無所不悅」是孔子用來批評顏淵的話，但這種理論是不利於統治者的，所以只要社會上有統治者，就一定要代之以於他們有利的理論。

後人怎樣一代一代歪曲原始儒家的思想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可惜到目前還沒有人去做這研究。

問：在原始儒家思想裡面，有關性與天道的問題，「論語」很少談論到，但爲什麼在「孟子」却是重要的課題？

答：孔子說道德也說天命（上天命令你做的就是天命）；關於性，孔子只說過一句「性相近，習相遠」，但這句話並未點出人性。在孔子、墨子、老子的時代，人性並未成爲熱門問題，所以很少討論，但到了孟子的時代，已經有人性論，人性已經成爲熱門課題了。

孟子與告子討論人性，告子以人的慾望的總和是人性；孟子反對把人的慾望和道德生命分割，提出一套新的人性論。他不抹殺告子「食色性也」這個論點，只是說人性論不能是片面的，不能只談食色而必須強調天和人不是對立的，天命落實在人性，道德就是天的命令，就是天在人性中種下的根。

問：那麼中國和西方的道德傳統有什麼分別？

答：西方的道德哲學着重分析，中國則知行並重。西洋哲學的道德傳統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因爲由認識論出發，認爲最好能找到一種事物的屬性，作爲道德的基礎，中國則沒有這種看法，而只是用禮義的規範來表現道德。

問：對於現代的功利社會，道家思想是不是一服有效的清涼劑？

答：老子思想的重點在於存真去偽，存自然、

去虛矯。不過如果針對對現代的社會，用「少私寡慾」和「知足」的主張更爲直接。人類不斷追求物質以滿足慾望，現在的社會變成這樣功利，就是這種不知止境的慾望作祟。

一般人說要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但什麼才是「最低限度」呢？今天我們見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謂必需品不斷增加。舉個例說，以前的人有一座黑白電視機已經很滿足，後來變爲彩色，現在彩色電視也不夠，要有一座錄影機。所謂慾壑難填，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寡慾」「知足」。

問：老子和莊子雖然同是道家人物，二人的思想是否也有很大分別？

答：老子着重的是實際做人：「要做人怎樣做才好」，他絕對不談生死問題。莊子所關心的卻是：人生來就要死，但人都怕死，那麼如何消除這恐懼，能做到這一點，便是所謂「如解倒懸」了。

莊子的思想和佛家的思想有相似之處，不過佛家相信輪迴，所以多出一重困難。雖然莊子的寓言也有類似輪迴的思想，例如他說：「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但他是否相信輪迴則很難確定。佛到莊子中間有二百年，所以他受佛家的影響也不是絕對無可能的。

此外，莊子對許多哲理性的問題都很有興趣和見地。例如語言和意義的關係等，可惜今本「莊子」實在太殘缺，所以要研究，恐

怕現在還不是時機。近年發現了兩本西漢的「老子」，如果能夠發現一本較早的「莊子」，相信對莊子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

問：你現在是不是在整理先秦的思想史？

答：中國古代哲學典籍中，看起來真正沒有問題的，不多，「論語」、「孟子」大概不成問題，「老子」可不代表一家的思想，很難確定，「莊子」則太殘缺，所以我研究先秦思想並不以一家一派的思想學說爲對象，而是從不是專講一家思想的「呂氏春秋」（後序寫於公元前二三九年）和「淮南子」（公元前一四〇年左右）去了解百多年間中國的思想發展。因爲兩書都是集大成之作，可以得到較全面的認識。我認爲把公元前三世紀中葉中國思想一些基本概念抽出來加以理解，然後才可以了解當時的宇宙觀、人生觀。

問：依你看，中國古代思想在一些概念上是不是和西方有基本上不同之處？

答：是。這種概念上的不同，可以用一個例來說明。西洋科學的發展基於利用機械因果概念去說明自然現象，這概念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愛因斯坦後才改變。對於西方用因果概念去解釋的東西，古代中國人不止用一種概念來解釋，其中一種就是感應。例如荀子說：「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就是這個意思。另一種是

「同類相召」的概念，例如荀子又說：「馬鳴而馬應之」，這是因為「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中國人從這出發點追問：爲什麼同類的才會相應呢，從而再進一步推廣來解釋其他範圍的現象。

問：這項研究你已經做了多久呢？

答：我是先研究「淮南子」的，做了約十年，現在研究「呂氏春秋」，進度較快，希望一兩年後可以做出一些結果來。

問：除了哲學，你對翻譯的興趣也很濃厚，是嗎？

答：我在外國教中文，用的方法就是在課堂上即席翻譯，也就是說用的仍是學拉丁文、希臘文時翻譯成英文的古老傳統方法。這對老師和學生都是很好的訓練，要練到一聽就知道對不對，是不是忠於原文，說的是否真正通順的英文。

我的興趣主要在古書的翻譯。可能因爲我受過哲學的訓練，我要求文章在語法上清楚明白，所以翻譯「論語」「孟子」時，對原文文法比較注意。此外，又特別注意一句話在表面意義之外沒有表達出來的隱含意思——即言下之意。如果不明白背後的意義，便不能翻譯得成功。例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一句，照表面意義譯，很容易引起外國讀者的誤解，以爲古人太自私，必須

把真正的意義譯出來，譯成 *Men of antiquity studied to improve themselves; men today study to impress others* 才不會有誤解。

問：翻譯最困難的地方在那裡？翻譯文學作品與思想性文章有什麼顯著的不同？

答：翻譯時，我們要知道一個字的基本意義在那裡，引申意義又在那裡；如果在一句中，用的是引申意義；譯出來的英文字，即使與中文字在句子中的意義相同，但如果基本意義不同，還不能算妥善的翻譯，仍然要另找一個在基本意義上也貼切的字。這是翻譯最困難的地方。

我從前翻譯的都是思想性的古代典籍，近幾年才對詩詞翻譯發生興趣。我以爲譯文學作品要譯出作者文字美妙的地方；譯思想性的文章，則要絲毫不能歪曲原文的思想，要顧及言下之意。

問：最後，請問翻譯是可以傳授的嗎？

答：教授翻譯的公式是可以的，但公式對實際翻譯幫助不大。至於文字上的敏感是磨練出來的，教師只能從旁指點，不能有系統的教授。

如果要將甲語言譯成乙語言，譯者必須能夠絕對理解甲語言，但不一定要能寫得好，對於乙語言則一定要能運用自如，才可以勝任。

#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

劉殿爵教授

香港中小學生語文程度低落已經成為社會人士所極端關注的問題，也是這次「香港語文教育研討會」召開的原因。我們都希望語文教育能夠辦得好，希望教育出來的學生無論在講、讀、寫各方面都能如意地運用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在今日的香港社會，各位一定同意應該包括中、英兩種文字。這次要探討的是如何才能達到提高語文程度這目的。不過英文教學不在我要討論的範圍之內。我只想就中文教學方面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希望可以作為研討的出發點。

## (一)

最近在語文教學的討論中常常出現「母語」一詞。一般來說，「母語」當然是一個人自己本國的語言，但在語言教學上，「母語」應該理解為第一語言，是和第二語言相對而言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區別很重要，因為兩者的教學方法基本上不同。如果硬把第二語言當作第一語言看待，結果即使不完全失敗也要事倍功半。那麼，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在學習上有甚麼不同呢？第一語言學習的特點可以就以下各點分別來說。第一點、一個人生來就有學

語言的潛能，而不論學的是甚麼語言這潛能一樣能發揮，所以除了某種低能兒童外，沒有不會語言的人。但這潛能有一個特點，這就是當一個人學了第一語言之後，到了相當年齡就要失去一部分適應性，這就是說，學了第一語言之後，這語言的種種特性，無論在語音、語法、語感各方面，一旦「習慣成自然」，以後再要學另一種特性不同的語言，就要經過長時期的學習和適應。這往往要比學第一語言困難，至於能否成功，或成功到甚麼程度，那就要看個人的語言天分了。第二點、第一語言一定是從小就學習的，就是說從語言學習能力最初顯現時就開始學習。相反地，第二語言就說不定甚麼時候才開始學習，但必然是在學會了第一語言之後。要是一個人從小便學兩種語言，他兩方面的語言能力很可能是不分上下的，而這兩個語言就無所謂第一、第二了。第三點、第一語言一定是在一個單一語言的環境中學的，而第二語言便不一定。第四點、第一語言的教學與學都是不需憑藉課本，不求有系統，不講究教法，只靠在單一語言環境中的浸淫就可以成功的。

第二語言的學習不可能具備學習第一語言

的優越條件。第一、以上已經說過，學語言的潛能就第一、第二語言而言，有質的不同。經過第一語言的學成，潛能已往固定的方向發展，所以第二語言學起來必定要比第一語言費勁。至於年齡與環境的兩個條件亦必不能同時具備。在單一語言環境中學第二語言，經常接觸到說第二語言的人不會太多，所以即使勉強令小孩從三、四歲就開始學第二語言，效果也不能與第一語言相比。至於爲了學第二語言而移居另一語言環境，這即使能收效也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可以不必討論。其實這還是和年齡的因素分不開。到了相當年齡才到外國去，即使住上一輩子，外國語仍然學不好也很平常。不過這兩種情形都和我們所面對的實際情況大不相同。我們的實際情況是兒童到了六、七歲才學第二語言而學習環境又是單語的。

第二語言的學習情況既然與第一語言不同，那麼方法也需要相應地改變。首先，第二語言的教學必須有系統地利用課本，同時必須學習語法。在這裡特別須要注意的是，第一語言的學習可以說是全憑浸淫，一日之內，所聽所說無非這一語言，自然而然便能掌握。第二語言却不同。學習時每日不一定有得有機會接觸這語言，所以無法說得上浸淫。因此不能利用學生對第一語言已掌握的知識爲基礎。凡是可以直接或間接利用的語言習慣都要加以利用。只有這樣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就香港的小孩子而言，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第一語言是廣州話。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再進一步說，在六、七歲以前正式去學普通話或英文的可說是不多。有些家長從小便把兒女送去學英文，目的在令他們中、英語都一樣能夠運用自如或甚至令他們以英語爲第一語言，這超出我們要討論的範圍，可以置之不論。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大多數兒童而言，普通話（說的方面）和白話文（讀與寫的方面）不能不說是第二語言。我這個說法或許有人認爲言之過甚。廣州話是中國的一種方言，普通話是一種共同的標準語，兩者之間關係密切，怎能說成第一、第二語言呢？這其實是一個名稱的問題。怎樣才算是兩個語言，怎樣只算是兩種方言，這界線是很難畫清的。法語和意大利語是兩國語言，廣州話和湘潭話是兩種方言，但我猜想，一個法國人學意大利語不會比一個廣東人學湘潭話難，當然在某些方面任何一個中國方言和另一中國方言肯定是非常接近的。但就是因爲接近，學起來有特殊的困難，無論在語法或詞彙上都會有相近而不相同的現象出現。這些地方學起來，要完全正確地把握是不容易的，同時又因爲大家認爲方言不過大同小異，所以沒有人去研究編寫這方面的教材，學的人只能靠口耳的接觸，而不能有系統地去學習。還有，學生學白話文的時候，我們不以爲馬馬虎虎就可算數，我們要求學得準確純粹，這便不是隨便學學就可以學得成功的。

話文既然是第二語言，就必須用適宜於第二語言的教學方法去教與學。這可以分三方面來說，就是語音、語法和詞彙。語音方面要以第一語言已有的音素為基礎，再進一步去學習和掌握第二語言中的音素。語法照我看來是最關重要的一方面，更須以學生對於第一語言已經掌握的語法為基礎，這就是說一定要對廣州話與普通話的對比作詳盡的研究然後將所獲得的成果應用到教學上。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語言習慣作為學習第二語言的踏腳石。近年來不少語言學專家反對教語法，一部分因為他們不承認語言學有規範性的任務，一部分因為他們認為學語言只須用直接方法便能成功。我現在所說的話，在許多人聽起來，一定覺得很

時髦，但我以為在教育上時髦的理論不一定正確。在座各位大概還記得不太久以前所謂「新數學」曾經風靡一時，結果教出來的學生連加減乘除的四則演算都有問題。現在教英文不用教語法的說法又時髦起來。這就是我上面說過，硬把第二語言當作第一語言看待的辦法。將來學生既不會拼字又不能做出通順的句子來，這是必然的後果。如果這種時髦的方法推廣到白話文的教學上，也同樣地要產生不良的效果。我這裡所主張的是，教學第二語言不但要着重語法而且要着重對比語法，既然要作對比研究，則第一語言的語法的研究也成為先決條件。至於詞彙，這可以說是最棘手的問題。一般來說，一個方言裡面，最生動，最富表達性的詞彙也就是這方言所特有的。第二語言學得不到家，寫作起來必然詞彙貧乏，不足以作縝密細緻的

表達。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運動以來，廣東出過些甚麼傑出的小說家？廣東不產生小說家並不是說廣東人才智不如人，而是說在文字上一上場便吃了大虧。我所說的話，請不要以為是提倡方言文學。我的目的只在指出詞彙在語文教學上的重要性，要學好白話文，必須學到能掌握豐富的詞彙。要達到這目的，我們必須注意工具書的編寫，如果有一本可靠的「廣州話普通話對照詞彙」，說廣州話的人遇上一句話不知普通話如何說法的時候可以查檢，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 (三)

談到普通話問題，我是主張學普通話的。如果語言包括講、聽、寫、讀四方面，普通話是屬於講聽的範圍而白話文是屬於寫讀範圍的。光就這一點來看，普通話已經是語言教學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但普通話的重要性還不限於此。我這裡所說的「普通話」，主要是指普通話的發音，（以下為了簡便起見，可用一個舊一點的名詞，稱之為國音）和基本的句式，再加上一些與廣州話顯著不同的基本詞彙。那麼這樣的普通話又有甚麼用處呢？我認為有一個極大的用處。

上面說過，語言的學習主要有賴於頻數的接觸，有賴於浸淫於一個語言環境之中。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古人對這道理已有清楚的認識。孟子曾以語言學習為譬喻說過這樣的話：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這番話所講的就是語言環境的重要性。要學齊語，在一個人人都說楚語的環境中是很難成功的，相反地，轉換到一個人人都說齊語的環境中，很難不成功。

香港是一個幾乎清一色說廣東話的語言環境，所以要學白話文很不容易，因為缺少接觸機會。要補救這個缺陷有甚麼辦法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回顧一下過去。中國千百年來，自從語和文分了家以後，所有寫文章的人都是做翻譯。這就是說他們日常思考用的一定是口語，而他們要把他們的思想寫出來時，就得把口語翻成古文。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體上，這翻譯工作是做得相當成功的。大文章家像韓、柳、歐、蘇不必說，就是一般讀書人古文大致都能運用得通順自如。這又是用甚麼教育方法做成的呢？主要是背誦。「古文」顧名思義是古代的文章，不是當代的口語，所以談不上語言環境。唯一接觸的機會是古文的閱讀，但閱讀是不夠的，不足以代替學口語時的聽與講，所以只有依賴背誦。背誦第一可幫助對古文文法的吸收，第二可以幫助古文詞彙的積累，但最重要的還是對古文的語感的培養。學一種語言，語感是最基本，最不可少的。平常用第一語言寫文章的人，遇着行文有甚麼不妥的地方，不會問自己是不是不合文法，而會將這一段文字反覆朗讀，憑語感去判斷和改正

錯誤。古人學古文的經驗和方法值得我們借鏡。說方言的人學寫白話文與學寫古文沒有很大的分別。如寫古文是做翻譯，寫白話文也是做翻譯。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凡是一個學生問：「這句話普通話怎麼講。」「這句話白話文怎麼寫？」他問的是翻譯的問題但今天在香港學白話文，情形要比學古文還來得複雜。我們聽普通話的機會不但不多而且似乎越來越少。舉一個例來說，十年前香港幾乎可以說是國語片的天下，一般看電影的人最少經常有接觸普通話的機會。現在情勢完全翻了過來。國語片爲了適應觀衆的口味都配上粵語對白。這一來連這樣的一個聽普通話的機會都沒有了。看白話文的機會當然有，但光看是不夠的。廣東人看白話文要朗誦時一定是用廣州音的。驟然看來，這似乎只應影響他講普通話的能力，不應該影響他白話文的進步，但細想一下，其實不然。白話文用廣州音念不容易上口。廣東人管白話文叫「的的麼麼」就是這個道理。白話文中的虛字用廣州音念起來極之彆扭，其中一個原因是普通話中有許多字的輕聲，廣州話則沒有輕聲，所以用廣州音念白話文，自然就把所有的輕聲都重讀了。這樣念起來，聽起來都很彆扭。既然用廣州音念白話文覺得彆扭，自然不能充份得到培養語感的效果。光是這一個關係國音的學習已夠重要了。還有一點。讀音是整個語言活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養成白話文讀起來必用國音的習慣，對於寫通順的白話文會有很大的幫助。同一個詞在普通話和廣州話含義不同，如果念的時候發音與意義相配合就不容

易混亂。舉例來說：普通話說「打尖」(dai tjan)，意思是指出門人在旅途中休息吃飯，拿廣州話說，就成了[ta² tsim¹]，意思變成不守秩序排隊，硬插到隊中間去。又像廣州話叫做「菩提子」的水果，普通話叫做「葡萄」，而廣州話中的「葡萄」却是另一種水果。如果我們養成一種習慣，見了第一種水果就說(dai tiao)，見了第二種水果就說[pu² tou²]，那麼寫白話文的時候就不會錯寫「菩提子」了。此外廣州話和普通話同一句式往往有微細差別的地方，如果發音上有清楚的區別也就不容易混殺。例如廣州話說「你走先」，普通話說「你先走」。如果用廣州話時說「你走先」，[Nei² tsau² sin¹]，說普通話時說「你先走」(Nei² xian zou)，「那麼寫白話文就不會錯寫「你走先」了。爲了養成用國音的習慣，我們應該在小學就教普通話，等到小學畢業的時候國音已能全部掌握。這樣，進了中學以後所有白話文的課文都可以用國音來念。(文言因爲廣州話保存了入聲，所以應該仍用廣州音。)在今天要提倡舊式的背誦，定必被人看作開倒車，其實我也並不是主張舊式的一字不差、從頭到尾式的背誦，而只是主張熟讀課文以便掌握裡面的句式和培養語感而已。

以方言爲第一語言的人還有一個困難，這就是詞彙的不足。越是日常的事物越是不知普通話怎樣說，因爲日常許多場合都不是聽或講普通話的場合。舉一個例來說，踏進廚房去，有多少算是能說普通話的人真能毫無困難地談

論烹飪的種種切切。這一個困難我們也必須克服，一個辦法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廣州話普通話對照詞彙」這一類工具書的編寫。

爲了避免誤會，有一點想附帶說一說：我把普通話白話文看作第二語言，絕對沒有貶抑的用在內。我所提出第一和第二語言的區別完全是從教學方面着眼的。如果這區別能站得住的話，語言教學的成功與否，在乎所用的方法是否合適。這照我看了一個以「語文教育」爲題的研討會上這是不應忽略的。

#### (四)

十年前，中文大學主辦過一個「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當時在中大主持「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的周法高教授作過專題演講，提出過許多寶貴的建議，其中包括「國語粵語的對比研究」「國語粵語對照語彙」和「粵語國語對照語彙」。在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開「語文教育研討會」，這些工作仍然是當前急務。中大當局對香港中小學生語文程度的提高極端關切，所以重新成立了「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我們希望在以後的幾年中能夠逐步完成上述的工作，至於工作能否做得好，進度能否滿意，除了靠人們努力之外，還有待於社會的勉勵和支持。

# 香港語文教育研討會

本大學中文系、英文系、教育學院與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於五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聯合主辦「香港語文教育研討會」。

研討會的宗旨，在於以客觀立場，通過學術理論研究，深入探討目前香港語文教育問題，並提供語文教學之可行途徑，藉以提高本港中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與英語教學的水準。

## 專題演講

「語文教育政策」 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羅德教授 (Professor R. Lord)

「智力程度、語文經驗、接觸語文時間與香港中學生雙語能力發展的關係」 教育學院蕭炳基博士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 中文系劉殿爵教授  
「古漢語在中學中國語文課程中的地位問題」 香港大學中文系馬蒙教授

「小學英語教學之探索」 香港教育司署英語顧問湯格先生 (Mr. R. K. Tongue)

## 小組討論

除五項專題演講外，研討會又舉行四次分組討論，圍繞一些重點問題，作深入分析：教學媒介方面包括教學語言媒介與語言學習及學科學習的關係，教學語言媒介的社會、經濟和

心理發展的背景；中文教學方面包括中文教學目標與教材，教學法存在着的實質問題；英文教學方面則包括近年最新發展的功能教學法，科技及專業英語，英國第一語言教學對外語教學的啟示等問題。

## 研討資料

研討會執行委員會會前特邀請本港各方面專業人員從不同學術觀點撰寫專文。並於研討會中發表幾項大型研究計劃的初期報告，包括：本校教育學院有關教學語言媒介對學生的學業成績與心智發展的影響研究、本校中文系學生對小學中國語文教科書的全面檢討、本校教育學會主持的英中學生對雙語媒介的看法調查、及中一學生的英文程度研究。

## 鄭棟材院長致開幕詞

首先我謹代表「香港語文教育研討會」主席團歡迎各位蒞臨參加。

近年來，香港學生的中英文水準日趨低落。在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後，學生程度將會更為參差，應如何解決中英文教學上的實際困難，已成為教育界人士熱烈討論的對象。

我認為本研討會至少有兩個意義：

第一：香港是一個雙語社會，對教育下一代而

言，中文與英文教學同樣重要。從語文作為一種工具的觀點來看，要使學生能夠掌握中文及英文這兩種工具，在教材及教學法上容有不同，但亦不無相通之處，因此在這次研討會中我們希望中英文教師共聚一堂，能共同建立一個互相交流及觀摩的基礎，以尋求改進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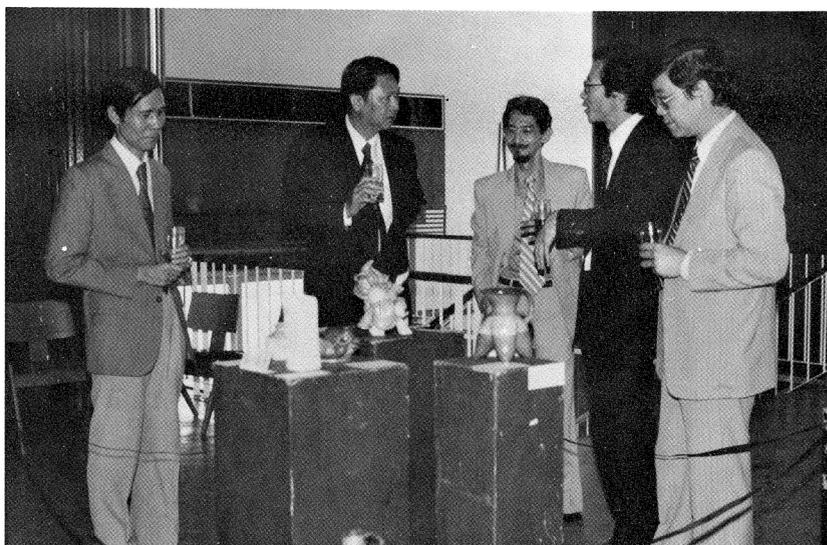
第二：語文教學不只是將某一種語言工具傳授給學生。說得更清楚些，不光是要教導學生發展其語文能力，同時亦發展其思想與個性。所以如要全面檢討過去和現在的語文教育，以尋求具體的改進辦法，必須：①由語文教師提供經驗及資料，②由語言學家和語言心理學家提供理論基礎及③由課程設計及教育研究工作人員探討有效辦法。即是說我們必須結合「經驗」、「理論」及「方法」去研究出一目前急需的語文政策。

我們都知道，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要衝，使學生兼通中英兩種語文，有敏銳的思考力，更有高尚的品格，是我們語文教育的目的。而這項目的必須由我們小學、中學及大學教育同業共同努力，政府當局公開支持及廣大社會人士通力合作方能達成。因此，我謹在此呼籲大家重視這項重大的問題。最後，這次研討會承港大中文系馬蒙教授、英國文化協會湯格先生為我們作專題演講，本港教育先進蒞臨指導，本人謹代表大會衷心謝意。

現在，本人謹宣佈大會開始，並祝成功。

# 覽展品作系術藝

至日五十月六年九七九一於系術藝學大文中  
作出展。覽展品作生學行舉堂會大港香假日七十  
油、描素、墨水代現、刻篆、法書、畫國：有品  
級分取採均品作有所。等塑陶、塑雕、畫版、畫  
課的設開所級各系術藝大中紹介以藉，列排式形  
要的師教科一每；類種之日科修所年學每；程  
聯的橫目科同不及以展發的縱內年四科一同；求  
。況情的步進學教個整解了能人使，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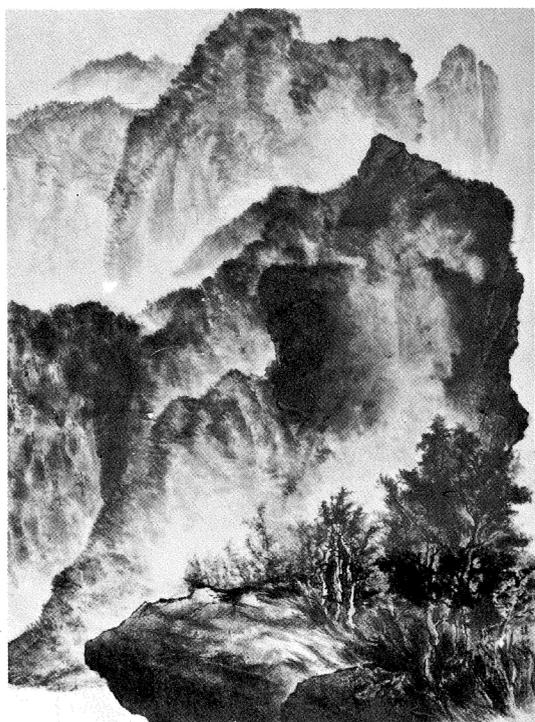
（右起）金耀基院長、屈志仁教授、鄺耀鼎先生、馬臨校長、李潤桓先生欣賞陶塑作品。



貓  
雕塑  
（紙料）

區艷玲

山水  
水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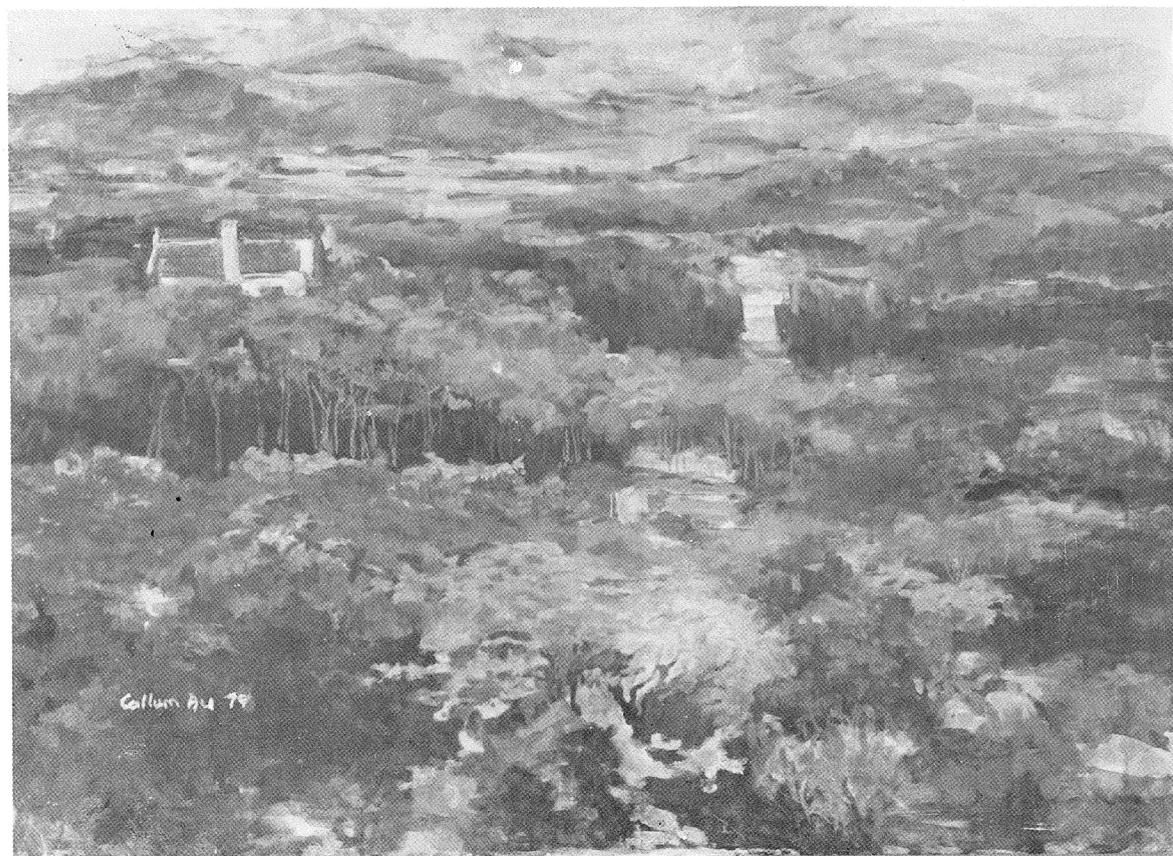


劉鎮和

戰爭  
版畫  
(金屬蝕刻)  
林振平



風景  
油畫



區嘉林

